

向生態懺情： 論李喬《草木恩情》與 《游行飛三友記》的生態倫理與懷舊意識

羅詩雲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部副教授

提 要

筆耕不輟的李喬（1934-）於二〇一〇年代先後出版《草木恩情》（2016）、《游行飛三友記》（2017）散文集，以草木動物之生態物種為映照自我生命經歷的出口，呈現超越人本主觀的環境意識與記憶感知。其筆觸涉及物我自然間關係變化的反思，結合個人經驗、家族史記憶與臺灣生態以完成一部懺悔錄式傳記文本；研究步驟上，鑑於二作皆構築於人我對自然生命調節和互動之生態倫理觀察，本文就此視景框架探究李喬所寄寓的個人感懷與文明省思；再者，討論以生態敘事臨摹個體生命經驗的記憶書寫，勾勒作者暮年所展現的懷舊情緒與重構家族史過往的主體意識。透過《草木恩情》、《游行飛三友記》的敘事框架和寫作策略，一則由生態倫理的特殊角度呈示作家的自我譬況、地方意識，以及反對「以人為中心」的意識批判；一則顯現定著於臺灣在地生活中風土地理、歷史文化與常民記憶的生命景觀。

關鍵詞：李喬 《草木恩情》 《游行飛三友記》 生態倫理 懷舊

向生態懺情： 論李喬《草木恩情》與 《游行飛三友記》的生態倫理與懷舊意識

羅詩雲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部副教授

一、前言：暮年李喬的生態經驗與書寫

臺灣戰後第二代作家李喬（1934-）的創作以小說為主，兼著散文、論述。1982年李喬退休後寫作不輟，近年出版《草木恩情》（2016）、《游行飛三友記》（2017）散文集，以自然生態物種為書寫核心，詮釋身為人類的「主體」與「環境」之間複雜、矛盾的相互作用，夾雜了個人的成長記憶與生命經驗。^❶論者形容此作為非虛構的記錄寫作，可歸為自然書寫的文類範疇。^❷生於日治時期的李喬，其長短篇小說和文化評論之著作質量多元豐厚，而創作以小說為主的李喬自覺小說已告完工，而將心力回歸於日夕相處的草木生界，聚焦對自我生命與社會發展的省視。李喬自述其作品兩大類型，其一是源自故鄉童年與現實生活，關於童年山居歲月的描寫；其二是對生命苦難的探索與生命情調的描摹。作家直

❶ 李喬生平簡歷，參見彭瑞金編選：〈小傳〉，《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7 李喬》（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年），頁43-44。

❷ 《草木恩情》表現作者與自然的互動、田野體驗與環境意識。陳惠齡：〈另一種台灣田野誌—李喬《草木恩情》的自然書寫〉，《臺灣文學學報》第34期（2019年6月），頁7-9。
(DOI: 10.30381/BTL.201906_(34).0001)

言「年事越大越能反觀自己」，而持續生命探索。^③以孕育自然、社會風土的童年鄉土為文化根基的李喬，認為散文是「執筆者心意念的直接呈現」，^④故前述《草》、《游》二作結合了個人獨特的山村生命經驗與感念，而能見出作家勤於嘗試的生命觀與臺灣社會觀察。

創作多產的李喬建造獨特的文學世界，並存有豐實的前行研究，在其諸創作文類當中小說研究仍屬主流。^⑤彭瑞金將李喬文學分為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文化論述、文學論述以及詩、劇本等面向；相關研究依性質劃分四類：一為李喬著作的專著（含學位論文、研究論文、資料彙編、傳記等）；二為生平自述、訪談、報導等資料，自述性資料尤其值得留意；三為作品評論，主論文學史地位、文學觀與作品印象；四為研究資料彙編。^⑥本文則嘗試於小說、文化論述、文學評論、詩、劇本等前行成果外，解讀李喬晚年散文的創作思維與關懷。依此二作內容，可見融合了作者生命經驗當中自然體驗與環境倫理的思考，而具有自然書寫關懷環境、社會的批判眼光，以及以身體介入的生態倫理等寫作特質。是故，《草木恩情》、《游行飛三友記》回應了自然寫作此文類，其對現代化之於自然環境破壞的問題意識，而凸顯生存倫理的課題。^⑦

③ 李喬：〈我的文學行程與文化思考〉，《臺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頁342-343。李喬此處雖為自身小說創作類型的說明，仍可對照其散文特質。

④ 李喬強調斯土斯民的文化觀特質，參見杜國清（Kuo-ch'ing Tu）、羅德仁（Terence Russell）編：《台灣文學英譯叢刊（No.36）：李喬專輯》（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14；關於散文觀念的闡釋，參見李喬：〈前言〉，《游行飛三友記》（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頁35。以下凡援引之《游行飛三友記》引文依此版本，皆於文末直接標示篇名、書名與頁碼，不另作註。

⑤ 杜國清認為李喬的文學世界可由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文化論述、文學評論、詩與劇本之五面向觀察。杜國清（Kuo-ch'ing Tu）、羅德仁（Terence Russell）編：《台灣文學英譯叢刊（No.36）：李喬專輯》，頁29。

⑥ 彭瑞金：〈李喬研究綜述〉，《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27李喬》，頁91-108。

⑦ 李育霖認為「自然寫作」在臺灣以新興文類的發展，是與在地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相關。作家經常透過書寫介入環境、知識與生態議題的關懷，帶出對生存倫理的議題探索。李育霖：〈導言 新地球的文學擬造：邁向地球美學〉，《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4-5。

前行研究與本文所論最相關者，為陳惠齡的〈另一種台灣田野誌—李喬《草木恩情》的自然書寫〉，呈現李喬由地景植物、個人生命史和族群家國隱喻等面向的敘事探討，指出以「草木」為輻輳寫作散文的特殊意義，為「自然書寫」創出新向度。⁸ 在前人嚴密論述之下，本文為李喬散文另闢生態倫理與懷舊意識的研究蹊徑，於作家暮年創作的生命有限性與其對創作的無限性追求之衝突作動，探論《草木恩情》、《游行飛三友記》當中李喬以生態為自然、自我立傳的目的意識與寫作思考，回歸作家如何實踐生命倫理的行動層次。若由《草》、《游》二書主題而論，一九九〇年代興起的生態批評是一運用於文學閱讀批評的可行方法。生態批評（Ecocriticism）是以生態學理念為核心架構，探討各式文本中人與環境社群間的連結影響，包括地景、生物、環境議題在文學上的表現。⁹ 李喬散文集二作前言皆闡述生態與自我的互動關係，並帶有對人類認知、行為層面促發環境問題的強烈懺悔感。因此，以「生態批評」的視角考察李喬此散文二作書寫，則可顯現人世之外人在自我生命實踐中面對生存焦慮與環境危機的主體建構，以及文本所呈現的環境意識與環境倫理之作家看法。¹⁰ 包括李喬以生態適應

⁸ 陳惠齡：〈另一種台灣田野誌—李喬《草木恩情》的自然書寫〉，頁 1-31。

⁹ 生態學（Ecology）是研究人類、生物體與外界環境間相互關係和作用機制的科學體系。所有人類活動都與地球其他有機、無機物相互影響，受於一樣的自然邏輯，故生態批評的文學研究可以納入非社會、文化的生界。生態批評（Ecocriticism）探討各種文本中人與非人間（包括生物與無生物）互動，是關於環境取向的文學、文化及其相關批評活動，以生態學和相關學科知識為知識基礎，因應環境危機成為人類所面臨的最大威脅，而生成於一九九〇年代的一種文學批評方法。生態批評的應用性可分為思維與概念的生態、理論生態學、文化生態學、以生態譬喻為重心的作品、以心靈與科技交鋒為素材、以人腦與心靈交鋒為素材等六類。前三者涉及生態理論及文學批評本身的範疇，後三者側重作品及閱讀策略。因此，「環境人文」、「生態批評」、「自然書寫」可說是環境、生態、自然研究的交疊領域，銘刻著深刻的倫理要求。生態批評的定義與討論，參見邱錦榮：〈作品、理論與生態批評〉，《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12 期（1995 年 5 月），頁 25-30。（DOI：10.6637/CWLQ.1995.23(12).21-35）；吳明益：〈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台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0 期（2010 年 4 月），頁 61-66。（DOI：10.6458/JTLS.201004.0045）；蔡振興主編：〈緒論 生態文學批評〉，《生態文學概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頁 1-2。

¹⁰ 生態批評不僅分析人類的生態影響如何累積在語言文學中，也將生態危機連結至人類主體的

的觀點，思考自身家族遷居與經濟活動調和的文化形貌，及其散文當中的生態修辭，皆助於詮釋李喬暮年的自然書寫。

生態環境是人類從事社會活動的依託或容器，社會生活都在一定的生態系統中進行並相互聯繫，李喬也自述思想形成之一為生態學原理。¹¹ 因此，本文引述生態學原理中生態倫理的概念，就人類進行與自然環境活動中形成的倫理關係與干預、調節等原則，探討李喬生態散文裡人類自覺、自省的主體精神狀態，以及追求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人如何重新建構環境倫理的思考；¹² 本文另一研討視角為懷舊意識。懷舊是主體利用回憶過去事件、感覺和想法，以促進生活品質或適應目前情況的方式，即一種重新詮釋自我價值與審視生命的路徑。¹³ 懷舊涉及了自我歸屬與情緒的概念、感受，呈現人對時代的症狀和歷史情緒，此特性符應了李喬將故園、家人的思念收束於童年回憶的生態寫作，呈示生態倫理中物我關係的個人記憶和歷史語境之主體形構。

《草》、《游》二書篇數相近，敘事結構同由物種名稱、習性、源流介紹

自我闡述與建構。因此，以生態批評視角討論李喬《草木恩情》、《游行飛三友記》，能一併考察作家對外的環境意識與對內的主體建構。蔡振興主編：〈緒論 生態文學批評〉，《生態文學概論》，頁 1-2 及劉蓓：〈論生態批評的生成語境〉，收於蔡振興主編：《生態文學概論》，頁 24-28；烏蘇拉·海瑟（Ursula K. Heise）著，陳佩甄譯，江凌青、朱惠足校譯：〈跋「人類世」的比較生態批評〉，收於朱惠足、貝格泰（Hannes Bergthaller）、唐納·菲利浦斯（Dana Phillips）主編：《全球生態論述與另類想像》（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16 年），頁 250-251。

- ¹¹ 李喬：〈臨走心聲〉，《思想想法 留言》（臺中：臺灣李喬文學協會，2019 年），頁 87。
- ¹² 在世界是一個相互依存的生態學概念下，生態倫理考慮了生物、非生物、生態系和生態過程等關係。而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主要透過人類的物質生產實踐來實現，被改變的自然環境也反作用在人類身心，故生態倫理等同根植於人的社會關係屬性之中。換言之，生態倫理把道德關懷和調節的範圍，從人與人的關係，擴大到人與動植物、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是一理解自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重要取徑。吳文新、王豐年：〈論生態倫理學中的人性問題〉，《哲學與文化》第 33 卷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138-139。（DOI：10.7065/MRPC.200607.0137）；林金龍：〈生態倫理：文明視野中的企業責任與經濟新秩序〉，《止善》第 1 期（2006 年 12 月），頁 88-89。（DOI：10.6487/ZS.200612.0081）
- ¹³ 李歡芳：〈老人自尊與懷舊療法〉，《護理雜誌》第 50 卷第 49 期（2003 年 12 月），頁 100-101。（DOI：10.6224/JN.50.4.98）

開始，後接個人記憶、互動體驗或在地歷史脈絡闡發，融會生命抒情、智識論理、倫理思辨、文化關懷等綜合筆觸以建構臺灣田野誌；然相異之處包括《草木恩情》附有圖繪，《游行飛三友記》為純文字敘述。文字情緒因書寫對象一為植物，一為動物，亦顯平靜與動態的對比。此外，寫作意識上《游行飛三友記》較記述懷恩心情的《草木恩情》更顯批判性。¹⁴ 研究步驟上，鑑於二作皆構築於人我對自然生命調節和互動之生態倫理思考，本文由此視框探究李喬基於生態學原理對環境倫理展開思辨的社會省思與個人感懷。即於人本倫理與生態倫理的相互辯證，檢視作家對當代人與環境的關係協調、變質樣貌及經驗再現；再者，討論以蕃仔林生態為敘事核心的記憶書寫，勾勒作者於暮年書寫所展現的懷舊情緒與重構過往關係的主體意識。透過李喬的敘事框架和寫作策略，一則由生態倫理的角度呈示作家的自我譬況、地方意識，以及反對「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批判；一則顯現定著於臺灣在地生活中風土地理、歷史文化與常民記憶的生命景觀。

二、自然生態的懺悔錄：

《草木恩情》與《游行飛三友記》的生態倫理

《草木恩情》與《游行飛三友記》由故鄉蕃仔林出發，強調人類與環境交疊的複雜問題，道出對自然生命調節與互動的生態倫理觀察，將書寫空間範疇擴充至人類之外的生態系。二作取材參互成文，由作家親身經驗出發，是為系列作。本節將由人與生存環境社群的相互關係與物種擬人化之敘事進行討論：

（一）生命調節和管理的我群 / 文明批判

李喬家族依存在僻壤山村管理杉木及種植蕃薯、菜蔬為生，自童年起累積對

¹⁴ 研究者介紹《草木恩情》、《游行飛三友記》各以 62 篇成書，每篇介紹 1 至 4 類物種，表現作者與自然的互動、體驗與環境意識。需更正的是《草木恩情》內容僅 59 篇，非 62 篇。李喬二書基本差異與整體系統，參見陳惠齡：〈另一種台灣田野誌—李喬《草木恩情》的自然書寫〉，頁 7-9。

土地的依賴，萌發對自然的崇敬和感恩。加諸戰後初期突患肺結核重疾的經歷，乃是家人買賣杉木方能買取高價特效藥治癒，愈加激發李喬對山林的感激之情。在李喬苦難重重的成長經歷中，考察《草木恩情》與《游行飛三友記》二作，皆寄寓樂於斯土的他對「生態人口」的摯謝與懺悔。¹⁵其寫作基調表達對己身作為人類物種的自我批判，是跳脫人本思考回到命運共同體的生態倫理概念。李喬積極探尋人類與土地、動物、草木乃至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表現以書寫介入生態環境的能動性，提倡共生共榮。試觀二作前言：

人類存活基本是草木所賜，而人類以草芥為鄙卑的代稱。不知他人感與動如何，我一生尤其到了老年，日夜時分，是滿懷對草木的感恩；草木與我的種種，在老年歲月，幾乎取代我人世的點滴。

意念心思到此，油然萌生動機：何不趕速筆記懷恩心情，兼述草木與我之間種種往事與懷念、領會？¹⁶

筆者是筆耕一生的老人，所以不能也不想追尋游行飛三者的「智識部分」，只談「相處」，認識感受，下筆時難免心存歉疚，「食物鏈」頂的保虫，為保育身軀，對於「三類」難免殺屠的「生之必要之惡」，下筆前先叩首領罪。（〈前言〉，《游行飛三友記》，頁5）

寫作意識上，李喬的生態學思想改變了人類主宰自然的人本倫理價值觀。《草木恩情》、《游行飛三友記》皆處理作家面對棲居生態環境中己身所為，為過往受養於萬物表達謝意或為罪惡殺生悔悟領罪，發揮求諸己身的省思視野。甚而有意識的述及臺灣地方社會乃至人類群體的層次，關照至現代文明、產業技術與生態

¹⁵ 李喬對「生態人口」的定義源於生態中心主義的思想體系，生態圈內的存在物都具有和人平等的價值層次：「游：泳於水中的族類，行：步行爬行陸地的生物；飛：飛翔天空的生物；游、行、飛三類同一時空內，不是隔離活動，都在『生態系統』之內，也就是『生態人口』的一部分。」（〈前言〉，《游行飛三友記》，頁5）

¹⁶ 李喬：〈前言〉，《草木恩情》（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頁6-7。以下凡援引之《草木恩情》引文依此版本，皆於文末直接標示篇名、書名與頁碼，不另作註。

之相互影響。此寫作視域彰顯影響生態命運的作用者，除了李喬一人外，還有友伴、家人、同事、村民甚或人類全體等社會關係，尤其《游行飛三友記》前言「『食物鏈』頂的保蟲」直述食性關係的人類權力為宰割生界人口的關鍵。

《游行飛三友記》所寫物種包羅萬象，涵蓋「益友」、「損友」，筆觸較《草木恩情》來得犀利且批判性強，刻劃生存是跨越生態物種的事實，回應生態倫理是種共生理念的價值。首篇〈保蟲〉以無羽毛鱗甲蔽身的保蟲為核心，展開人類心智演化與發明創造對自然界毀滅的強烈批判與深切自省。人類對生態資源的占有、自恃與缺乏自省，成為李喬此書寫作的問題意識與情感基調：「在二十世紀生態學概念普遍之前，都是以人為中心的存在觀；……就地球與「各蟲」角度看，保蟲的優越正是災難；生界唯保蟲俱備「反省能力」，可是而今反省了什麼？」（〈保蟲〉，《游行飛三友記》，頁 11-12）萬物之靈的人類擁有比生界更優越的心智結構，然佔有欲讓攻擊超越需求，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態勢禍及其他生命體。李喬更於此篇嘲諷敘述在人類毀滅前後，必然毀滅地球生界，呈現他對人類獨斷控制自然現況的現世悲觀。研究者李永熾指出李喬反對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他認為世界中人與自然應是相互含蘊、平等開放，人與其他生態人口和諧生存，不應控制自然或其他生命體。¹⁷ 由二作前言之省思，得見李喬由生態學提出「生態人口」觀念的寫作脈絡，其他各篇亦揭露人類對動植物生態人口無情毀滅的批判與無奈：「臺灣的千萬游魚、行獸、飛禽，今後十年二十年，還殘存多少？這都是保蟲，人類的業績，是的，是人的『業——karma』的成果。」（〈鷺鷥、小白鷺、白翎鷺、白鶴〉，《游行飛三友記》，頁 114-115），表現對人是何種罪惡存在的深刻反思與嘲諷。

批判整體人類之餘，李喬也誠實記錄對生態的個人懺悔與社會省視，懺悔如

¹⁷ 李永熾：〈他者的文化、文化的自我：李喬的文化論述〉，收於彭瑞金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7 李喬》，頁 322-324。李喬的文化反省重點有三：以人為一元中心的思考與制度、檢討現實世狹促的人生觀和生命觀、重新調整「人觀」，最末「人觀」的調整指恢復人為自然一部分的思行。李喬：〈漢文化批判、文化立國說〉，《思想想法 留言》，頁 31-32。

〈魚藤〉、〈楓樹〉、〈蕃薯鳥〉等篇所述蔑視物種生命的內在愧疚，或省視臺灣社會爾虞我詐的逐利鬥爭，諷其非自然的謀生方式。字句語調充斥老來之感的李喬，逐一清算往事且以噬心之痛形容己行，藉生態書寫招供對蕃薯鳥、泥鰍、藍鵲的三大惡行，而感嘆人為奪取下愈顯寂靜的大地；然而，《草》、《游》二作也寄寓李喬和生界互動的柔情關愛與誠摯感謝之溫潤底蘊，如〈香絲樹〉、〈刺波仔〉助於生活之燒炭、建材、除溼，或採、藏、吃等普用行事；〈見笑草〉、〈卷 a、花翼 e、白老鼠〉所述受物種謙卑卻又強韌之生命姿態而啓發的尊生態度；〈蕃瓜、黃瓠、南瓜〉、〈石斑仔、白哥仔〉各式蔬果物種對窮困歲月的滋養等，顯現生態人口對人類的供養恩情。李喬書寫除了顯影童年生活的光景，更架構對家園的山村記憶與區域意識，表現生態萬物對世界群體運作與個體生命存養的維繫。故其生態散文裡生界人口為實體性的存在，且與李喬之間存在著物質供給與互生存滅關係。各篇亦緊扣作者我群與生態的互動，或捕抓食用、或飼養遊戲、或商用植栽，甚或是彼此相伴寬慰，而闡發生態物種對人的意義與價值。

《游行飛三友記》多描繪三友在自然界生存的鮮活樣貌，以對比現今蹤影漸失的感嘆。從而察覺李喬對年輕世代今日所處環境變異的痛心，物種正名、環境感知和感官經驗皆難比擬昔日的豐富多元。李喬以鄉下長大的老人為立場，定位《游行飛三友記》是為不同世代來書寫趨近死亡的生命關照：「死亡，游行飛三界包括人類自己都不可能不面對的，所以下筆寫，心境不可清靜無波。……哲學，宗教，科學都有些『銜接』了，以這種『狀態』，親草木友游行飛三界，想來感恩又喜悅的。」（〈後記〉，《游行飛三友記》，頁 244）自詡雜學積累多年的李喬，面對生界死亡的絕對現象，自認領會一二，而著文懺悔己身，更含為生界祈求的意念，視域涵蓋地球生界、人類我群。¹⁸ 研究者朱增宏將人與動物的互動分為物質的、社會的及想像的三類關係，然在李喬的用筆下不僅是書寫動物的《游行飛三友記》，《草木恩情》亦呈現由「物質關係」延伸到「社會關係」

¹⁸ 李喬：〈人生意義：減輕生界痛苦〉，《思想 想法 留言》，頁 53-59。

乃至「想像關係」的敘事脈絡。¹⁹ 動植物之於作家甚或人類群體是實體存在，也具有精神或概念上的想像，或為生活主體，或為權利主體，或為生命教育者等，土地倫理尤為價值觀關鍵。

李喬《思想 想法 留言》基於生命終將回歸大地的理念，撰文人生意義的創造在於減輕生界痛苦，呈現謙卑姿態。此友愛生態的態度如〈鯉魚、草魚〉所述，生為魚蝦難逃成為人類的盤中飧，但人有義務給予合適的養蓄環境；〈家豬、山豬〉論豬以肉身養人、犬為人守家屋，提出罵人豬狗實是物種的誤用與偏見；〈細菌 ※ 病毒〉以細菌、病毒為鑑，貶抑消費環境的人類才是傷害地球最甚者。對作家而言，動植物的存在並非僅是人類的工具資源，尤其游魚、行獸、飛禽生態自成系統承載的臺灣土地，生界人口存續一切端看人類行動，回應生態與人類的社會關係；然李喬筆下的人類（倮蟲）大半未用平等的倫理情感對待動物，甚者恣意決定其生死，以錯誤的偏見定義其存有。這種蔑視生界的態度、行為描述，正是李喬欲傳達的倫理關照與文化譴責。

自然和社會、人和物件同屬社會集體；然伴隨家園環境質變的是人性迷失與利益追逐，人和物質概異化為可替換之物件，遑論人與自然生態的相處經驗。〈七層塔、蚬絲〉、〈公館紅棗〉所延伸的大眾口味、飲食特色之極端變化，帶出李喬藉飲食慣習的崩解以呈現文化體系潰散的相關省思；物種產業變化的唏噓另見〈香茅〉、〈杙仔〉，若失去商業利益則自然環境就此淪為任風雨摧殘的荒山草野，故鄉苗栗的沒落尤令人惆悵；此外，也見作家對臺灣社會時事的針砭，如〈Tokeso〉論百香果營養和抗癌功效，話鋒一轉而論臺灣政治叛逆分子的社會癌病變事況；或如〈美人樹〉因不察環境致使植栽毀敗的人為失措，批評人類未理解生態模式而強行操控的弊陋：

¹⁹ 物質關係中，動物存在的角色或意義是可觸、可摸的實體，人與動物之間是相互依靠、寄託的對象，知識作為關鍵；社會關係是人與另一個人甚而其他人與動物的關係，影響動物的關鍵因素是權力；想像關係中，動物不再是實體，而是精神或概念上的想像，關鍵是人對動物的價值觀。朱增宏：〈把雨傘留給蚯蚓？—從動物倫理對佛教及「愛與慈悲」的挑戰，談「佛法」的實踐〉，《中外文學》第32卷第2期（2003年7月），頁117-121。（DOI：10.6637/CWLQ.2003.32(2).103-130）

苗栗公館新築環市路，在北端由後龍溪「滾進來」的北風強烈驚人，結果把種在那一段的「阿勃勒」摧殘得幹斷枝裂。……台灣是亞熱帶（近年趨近於熱帶了），配合自然生態的和諧，相吸引、相輔補原則——唯有這樣的「形、色」，我們處身其中才舒暢、才心曠神怡。理論上說：人為的建構、設置、培植，要和環境的形色澤相容、相吸、相引，這才是建築的、美學的、生態學的「好」。（〈美人樹〉，《草木恩情》，頁 241）

引文由路樹實例強調人為培植必須重視生態學原則。李喬關於生態批評的議題、地方認同的想像之筆，亦涉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文明討論。〈杙仔〉直言農業邊緣化起因自政商貪圖糧食進口的利益，讓農人宛如被鐵鍊所拘束，表現自然生態與人性劣根的抗衡；〈牽牛花〉一則提示人類應運用油桐花另創文化產業，為牽牛花尋找生態價值的第二奇蹟，二則呈現客家群體的身分感。文化創業的敘述語帶諷刺，卻又顯得格外無奈；〈蟋蟀、草蜢〉抨擊當前世界的武器聲響、商業揚聲器、政治巨吼，對自然聲響的掩蓋；〈石斑仔、白哥仔〉藉魚類對比童年困厄與現代富足的物種消逝與價值演變，直言豐足社會中生態卻見消逝的現況。且此篇更批判眼見魚類絕命掙扎卻引以為樂的自己，令李喬頓悟不再釣魚。前述諸篇論述了人與生態的「想像關係」，草木動物轉化為環境美學、資本文明、文化產業、族群關懷或者時代精神的想像依託，陳述物種的多元生態功能。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指出人類苦難來自自然的毀滅力量、人體的衰老以及人際關係的不協調，而文明包含人類改造、抵禦自然的活動，以及調節人際與社會關係的方式等內容，文明的進步得以幫助人類抵抗與緩和前二者所造成的威脅與痛苦。²⁰ 李喬的生態散文因暮年有感而作，然現代文明並未緩和他面臨老年的考驗，反而疏離、切割自童年以來與自然生態的依附關係，甚至削弱了人類所存在的地方意義。前述困境一如作家所述：

²⁰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嚴志軍、張沫譯：《文明及其不滿》（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頁 23-25。

就我這個年齡的人，對於飛鳥行獸游魚的迅速消失深為傷感，這種心情，大概一天花一半的時間在網路遊戲的人，是難以體會的吧？不過，「也許」沒多大關係，科技越來越發達以後，也許有一天又可以看到甚至控制、指揮那游魚、行獸、飛鳥了。不過那是「高科技人造的」電子遙控物品，而那時人的許多「配品」也是人工製造的，反正人間往物化機械化大道邁進，也是進步又幸福的世代吧。（〈麻雀、魚狗〉，《游行飛三友記》，頁 59-60）

人類文明的過度開發不單影響環境生態的保存，更反饋至人類本身對物景感知的終極匱乏：「年輕一輩是想像不到的吧？隨時隨地低頭滑手機，才不會『感覺』身處的景與物呢。」（〈壁虎、攀樹蜥蜴〉，《游行飛三友記》，頁 78）顯示作家對少了「感覺」且機械化的生命意義之批判。李喬的生態散文回應了《文明及其不滿》所論之文明的高度社會性，表現文明發展過程中被視為野性或本能的自然界處處受到壓抑和人為改造的窘迫。總言之，人類的自大與物欲毀壞了家園環境與物我關係，造成無根、無感的身心漂泊狀態。由人與環境的物質性、社會性乃至精神面的當代關係變化，李喬凸顯在地日常生活與資本文明交涉下的生存疏離，含涉個體自我精神、社會異化樣貌與環境生態破壞等多重問題。

（二）物我關係的依附：生態物種的擬人化與移情投射

《草木恩情》前言提及李喬與山林空間的密切關係，已至彼此身心一體的共融感受，苗栗「山線」空間的草木、動植物不僅充斥心靈，更接連童年時期的記憶與感受，且延續至成年後的生活：

我的生活園地、觀察、思索環境，都在苗栗「山線」這個空間。……我這個人，書房群書外，最親最密的還是草木與群山。群山、草木填滿我心靈內外。我有時晨晚感覺到又置身童年時期那種身心內外都是草木，而恍然彼此一體的感與受……。 （〈前言〉，《草木恩情》，頁 6-7）

李喬在山線空間裡展現了人與臺灣土地上生物群落的倫理規範，以敘事行動介入環境，積極探尋人與土地、草木、動物之間的關係連動；²¹ 因此，他的散文空間中人與環境的交疊、構築充滿物件的記憶細節，其「山線」空間裡描繪的主角是自然草木生物，人為地景是鋪陳配角，主配角色環節之間以童年及家族史記憶串接。此外，李喬的生態散文亦是個體與周遭環境互涉下內部自我的主體化過程，即在物我的疊影中重新認知自我，同時通過書寫強化自己面對年歲逝去的生命焦慮，獲得生命存在的延續性體驗。

童年經驗是人格養成與主體性建立的重要階段，李喬的主體在蕃仔林的山線空間與土地群落中展現脆弱性，描繪創傷經歷及其與傷痛對抗的承载力。作家以藉物起興和擬人筆法觸及族群衝突、階級背景、生態環境等問題，呈現物我關係的依附、投射。如〈老鴉診〉、〈雞月赫卵〉由李喬備受歧視的山鄉孩子「山猴子」出身，對應至族群同類間搶奪血藤、頂鐘仔的欺壓；〈黃藤〉生長力強悍的黃藤猶如山中惡霸的比喻，觸動父親被警察以黃藤條毆打的幽默回憶；〈藕薯〉內無專植土地，不卑不亢的藕薯猶如無產階級，隱喻李家受限居所為人植木的背景；〈麻雀、魚狗〉由成鳥與雛鳥同行的捍衛姿態，雛鳥少有受襲，譽其為好父母，流露李喬山居歲月對物種習性的細緻觀察與親近。作家視生態為平等共生的存在，故物種常以人的姿態現身，帶來種種生活感悟與人生體認。李喬以記憶、感官見聞描寫物象，並將其人格化賦予思想、感情或行動，此書寫取徑實是李喬肯認自己所親受的苦難，傷悼、體認生命的羸弱與不完美。²²

敘事觀點的運用反映人與自然的互動模式，李喬採用旁觀視角的寫作策略，

²¹ 土地倫理指處理「人與土地」關係的一種倫理規範，土地具有群落的概念且是人類倫理的延伸，土壤、空氣、水、動植物等生命與非生命體都屬土地社群。觀察李喬生態散文二作除了動植物生態，亦論述環境汙染、河川變遷、土地開發等非生命體的倫理議題。鐘丁茂、徐雪麗：〈李奧波《砂郡年記》土地倫理思想之研究〉，《生態臺灣》第6期（2005年1月），頁77-80。（DOI：10.29820/TAE.200501.0017）

²² 歷史上各式創傷記憶的重述實為某種形式的行動主義，體現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的生命脆弱性，其中回憶苦難的方式之一為悲傷，牽涉記憶召喚的倫理與政治問題。李有成：〈創傷〉，《記憶政治》（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37-38。

暗示他對自然所知的有限性。跨物種之間的同理心是理解與再現他者所必需的認同化過程，李喬藉由生態物種的擬人手法與移情投射，以消泯人類與其他物種的二元對立，營造平等、相互理解的生存樣貌。²³ 此跨越物種鴻溝的人格化筆法尤見於《游行飛三友記》，由動物釋名、互動無不流露作家抱持對等、互敬的態度以待，連用約會、交手、逃難、認同、離職、鍛鍊等詞彙，細數與生界三友的往來。此外，生界人口在擬人、旁觀的修辭中，饒富李喬生命經歷的中介聯繫，如〈木瓜〉、〈臺灣藍鵲、烏鳩〉藉木瓜樹互文闡述他與生態互動的兩段糾葛，一是擒捕掠奪木瓜的藍鵲而產生的仇隙與愧疚，二是植栽木瓜樹的不服氣：

我小大哥十三歲，我想那棵木瓜樹可能比我「年長」。

我猜想那棵木瓜，大概是為掙脫烏葉竹叢的包圍爭取陽光，樹身大幅度地西斜；記憶中木瓜樹樹基起一丈左右才「開枝極」，這段主段可以雙腳行走不需雙手協助的。我六七歲未上學前，我做了一樁「壞事」。

這棵大木瓜樹，也許年紀太大，對於四季時序失去反應本能：一年到底都在開花、結果。……更可惡的是，牠們會把「半黃」的黃熟部份吃掉，其他部分「寄留」樹上，等待黃熟時刻再來「續餐」。（〈木瓜〉，《草木恩情》，頁 61）

掙脫竹叢的年長木瓜樹以及寄留、續餐的藍鵲，李喬生態書寫的草木動物與人類同具有情感、行動選擇，只是其存在樣貌乃由李喬的旁觀視角來鋪敘，並留下想像空間。

人類與物種間的情動連結是一種關係的再現，也暗示新的主體構成與倫理要

²³ 此認同化過程是發自尊重生態物種而嘗試相互理解、溝通的生命價值認知，而非發於人類中心主義的擬人化或他者化。朱惠足、貝格泰（Hannes Bergthaller）：〈序言〉，收於朱惠足、貝格泰（Hannes Bergthaller）、唐納·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主編：《全球生態論述與另類想像》，頁 12。

求。²⁴〈臺灣藍鵲、烏鳩〉藉客家童謠詮釋生界的循環動態與歸於自然的法則，表達包含動植物、地貌景觀等生界群落的土地倫理；然而物競天擇、食物鏈、天性等自然演化法則，雖有如〈吾家狗族〉、〈蠶仔〉物種習性為生存資本的想法啟發，或〈蚊仔、蒼蠅〉蚊蠅依自然而行傷害人畜的省察，卻也令李喬悲嘆生命存有及過程的悲哀、無奈：「雞因人的飼養而大量繁殖，不然可能滅種，然而生存『目標』是人的盤中餐，生命的意義究竟如何判定？無言。」（〈雞仔、竹雞仔〉，《游行飛三友記》，頁125）。此生界演化的兩難加諸華人文化的食補概念，令自認環境論者卻身為食物鏈頂端的作者愈加體認生命的難處。

《草》、《游》寄寓作家對生態的同理觀察與移情理解，這些生界人口猶如長於邊陲的李喬之身心映照、思考借鏡，或親友夥伴，甚至是救命恩人。如〈蟬〉從感官記憶描繪幼年玩伴蟬仔的身影與聲響，感念窮困孤寂的成長中幸有牠的陪伴：「關於孤單、寂寞、害怕、盼望等混合的心情，大概世人難以體會甚至想像的，不過『黃昏蟬』大概知道……。」（〈蟬〉，《游行飛三友記》，頁34）蟬鳴化為暮年老衰的李喬主體，更是支撐創傷心靈的內在呼喚，令作家自喻是唱聲沙啞的黃昏蟬，物我合一；〈水蛭〉從對比思考將水蛭比擬社會負面人物，啟示其若獲良善引導也許能對群體產生貢獻的文化學習；〈猴子、貓頭鷹〉、〈蛤蟆、青蛙、蟾蜍、田雞〉、〈蚯蚓、螳螂〉各以「糾紛」、「接觸」、「緣分」、「關係」，不分物我尊卑，表露對猴肉、蟾蜍肉，螳螂土法救命的知恩感念和心靈傷痕；除了童年與生態的青春記憶，李喬亦以同樣筆法描繪成年後的自然體驗，如〈台灣連翹〉被人為修剪得無從翹起故顯得「乖巧」，令人興起憐惜之情而為其謀取植栽空間；〈昭和草〉感念二戰期間供養窮困大眾的重要價值，故喚昭和草為「仁兄」以表敬意。對照因生機飲食風氣重現餐桌的現今景況，李喬對此無法言喻，僅得回想近代臺灣與昭和草的因緣以示感慨。

移情（Transference）與個人的成長史、經驗和當前的需求狀態有關。意指人們常無意識地將自己對某人的情感、期望投射或重現至他人身上，是一普遍存

²⁴ 宋偉杰、李育霖：〈環境人文、生態批評、自然書寫芻議〉，《中國現代文學》第36期（2019年12月），頁2。

在於日常生活的人際現象。²⁵ 承此詮釋，李喬的生態散文可謂重現他以往關係與檢視現今社會的敘事移情，以此追溯情感、記憶的來源而表達對自我主體與社會樣態的認識。對生養自荒窮山村的作家而言，生態環境是與人類生存相依互存，當人類貪婪的以各式藥劑「謀殺」蟲鳥致使大地失去生機，又將使人類該如何謀生。生態批評的價值觀有別於社會既往以人為中心的理性觀點，轉向追求人與自然的新互動關係，且強調非人類存在的價值與身分認同的重新定義。²⁶ 李喬透過土地、草木、動物等生界樣貌和感官記憶，重新省思現代人與環境的關係互生和變質，悲觀之中仍寄寓改變的盼望。文本擬人、移情筆法則呈現李喬潛意識對早年經驗與社會關係的重現，包括對童年生活負面情緒、意念、經驗與生態依附關係的應對處理。於此，作家發乎生態倫理的寫作意識乃為一種內在自覺的表現，表露暮年寫作直視生命與定義身分的潛在心理。

三、重返「蕃仔林」： 懷舊敘事中的童年空間與家族記憶

李喬生態散文展現個人濃厚的懷舊情緒與主體記憶，表達對風土地理、歷史文化與常民記憶的環境與個人思辨，其在地視域、歷史人文與生態書寫對象形成相互指涉、記憶的關係。本節將由李喬主觀意識下混合情思的生命敘事空間——「蕃仔林」，論述其暮年散文的懷舊空間與家族記憶：²⁷

²⁵ 移情的定義與運作，參見陳金定：〈移情現象之驗證：運動選手親子依附與教練－選手關係之因果模式探討〉，《教育心理學報》第40卷第3期（2009年3月），頁363-366。（DOI：10.6251/BEP.20080509）

²⁶ 蔡振興主編：〈緒論 生態文學批評〉，《生態文學概論》，頁3-6及劉蓓：〈論生態批評的生成語境〉，收於蔡振興主編：《生態文學概論》，頁38-39。

²⁷ 暮年定義概以時序性（生理年歲）、功能性（生理機能）、文化性（文化意涵上社會對老年的正負期望、想像）三者劃分，且因人生即邁向老年的進程，故三者彼此交疊、滲透，更涉及主觀觀感、性別、社經地位與生活經驗等因素。黃柏源：〈蘭姆書寫中的老年與退休〉，《英美文學評論》第37期（2020年12月），頁103-106。（DOI：10.6711/REAL.202012_

（一）童年空間的徘徊與懷舊

「懷舊」(Nostalgia) 其意包含對記憶、歷史的回想與追尋，是複雜而細密之思想和意識狀態，具有美化過去與建立自我身分的功能。其帶有烏托邦的傾向，預設過去為美好的，且過去的安慰可以治療現在的傷痛。²⁸ 故山村童年時光可視為作家暮年生命的一種失落物，結合他的書寫主體性與生命歷程省思，由此創作一系列以蕃仔林為背景的小說：「李喬的文學世界所呈現的『蕃仔林』，是一個窮鄉僻壤、荒山深野、充滿生命苦難和人間病痛的陰暗世界，也就是他 29 歲開始文學創作時，所面臨、回憶、思索和描述的童年故鄉。」²⁹ 如何再現過去是生態文學一重要議題，李喬亦自述其寫作具反身回顧的自傳性。³⁰ 李喬的創作同以家鄉「蕃仔林」為萬物生態存在的經驗空間，透過《草》、《游》二作由過往生活記憶反思今昔臺灣的社會差異與生命態度。懷舊是一種情感的喪失和轉移，卻也是個人與自我想像的浪漫關聯。此寫作設定回應了斯維特蘭娜·博伊姆 (Svetlana Boym) 提出的「反思型懷舊」型態，李喬徘徊於無法復原、歸返的地方家園——蕃仔林，進行個人生命史與家族記憶的敘事描繪。³¹

(37).0003) 李喬在《草》、《游》二書〈前言〉基於時序性定義自我已是晚年，功能性老年狀態述及生涯退休與疾病，文化性老年狀態則談到哲學、宗教、科學等智慧分享與補足文學生涯欠缺的創作期望，唯有文化性的老年狀態進程得以超越時序性和功能性的衰退。

²⁸ 蔡振興：〈《劍鈴與秧雞》中的童年記憶〉，收於蔡淑惠、劉鳳芯主編：《童年·記憶·想像：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頁 57。

²⁹ 杜國清：〈「李喬專輯」卷頭語〉，杜國清 (Kuo-ch'ing Tu)、羅德仁 (Terence Russell) 編：《台灣文學英譯叢刊 (No.36)：李喬專輯》，頁 30。關於「蕃仔林」對李喬文學的影響、文獻探討、作家訪談，另見黃小民：〈第二章 李喬生平與寫作歷程〉及〈附錄二 李喬專訪〉，《歷史的謊言·鄉土的真實——李喬小說創作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頁 15-20 及 291-304。

³⁰ 「我近中年才全心寫作，所以所謂『自傳性』，是人格（心理學的）成熟後『反身回顧』的『自傳』，理論上說：已然諸多 fiction 成份了。」見李喬：〈臨走心聲〉，《思想想法留言》，頁 111-112。

³¹ 懷舊定義之外，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提出修復型的懷舊 (restorative nostalgia) 與反思型的懷舊 (reflective nostalgia) 的兩種類型：前者試圖通過歸鄉之路，跨歷史地重建失去的家園；而

散文與小說經營不同的是，李喬將童年作為寄喻想像的客體空間，生態物種為書寫主體記憶的重要載體，以童年與生態二者作為再現過往歷史與保存正負面記憶的關鍵。如〈蕃薯〉敘述父親（李木芳）因參與日治時期農民組合的異議運動，而遭日警限制住所的政治迫害。在此限制下李家是第三級耕山地佃農，只得依靠替人管理杉木與種植蕃薯、菜蔬為生，地主所留的兩分地成為李家在僻壤山村活命的倚靠；〈藕薯〉寫茅屋前後左右空隙種滿藕薯，雖是被忽視的一群卻為窮苦人的「大餐」。加之《草木恩情》首篇〈菅草〉即記童年故鄉蕃仔林的歷史來由，〈蕃薯〉、〈藕薯〉、〈菅草〉等篇定調以家屋向外輻射的童年空間書寫，亦凸顯草木生長與李家生存應對的艱困與強韌：

我的童年故鄉在苗栗草莓勝地大湖鄉之東，「番仔林」是跟泰安鄉接壤的地方。台灣歷史上有原住民「漢化」的名詞；我這一群是「番化」的漢人。實際上『番仔林』是泰雅人舊居地，無論耕作打獵都不適合而遷徙；漢人得到默許才移入的。這段交代是在說明：「當年」番仔林是真正荒山莽野。那樣的山野，草本植木最強悍的就是菅草。（〈菅草〉，《草木恩情》，頁8）

李喬翻轉了原住民漢化的概念使用，形容我群是番化的漢人，是在艱困的自然環境中奮鬥求活的群類。當挨父母打罵或見父母吵架時，菅草叢即兒童李喬庇身之所，更由菅草外在鋸齒形貌所蘊含的自衛本質，延伸至家庭內部成員的關係與自我性格、人生的比擬。李喬對於苗栗山線的家園定位，回應研究者王諾所論回歸土地處所並不意味所依附的是理想優美的家園，也可能是艱險困苦的自然區

後者在渴望與追求中發展壯大，有意延宕歸鄉的路程。（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llana Boym）著，楊德友譯，劉東編：〈導言：忌諱懷舊嗎？〉、〈第四章 修復型懷舊：密謀與返回本源〉及〈第五章 反思型懷舊：虛擬現實與集體記憶〉，《懷舊的未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頁1-9及46-63。

域。³² 李喬的童年空間也並不全然艱苦，亦有如〈菜瓜〉以平民化瓜果棚下的生活場景，點描鄉間老少的日常閒散。「蕃仔林」這一特定自然處所和生命記憶、地域歷史的有機融合，銘刻李喬主體的童年成長經驗，致其行動和觀念形塑出獨特的人格特質與文學創作的痛苦哲學。³³

成長後的李喬雖離鄉生活，但通過環境的今昔變化和已逝人生的書寫對比，即以蕃仔林為參照的自我認識，將思鄉情感的成長失落或缺失遺憾，藉由生態萬物投射至山村童年的記憶空間，表達濃厚的懷舊意識與情感彌補。《草木恩情》〈序言〉自述群山草木是心靈憑藉，草木與自己種種往事佔據了老年歲月的人世點滴，〈葛藤〉亦言童年歲月是草木使甦活起來的。這種暮年懷舊的強烈創作意念，回應李喬自述創作的想像來源，包括潛藏的童年意識、對大眾的關心以及對大地的鄉愁等。可以說，李喬自我認知和自我實現並不全然訴求自身內部，亦探求身外的處所或世界所延伸的空間記憶，而存活在此童年空間內的物種，成為了延伸意義下沉默的家族家人。「蕃仔林」連結李喬與家空間內的存在物，並在聯繫網絡中呈現各自的存在意義：

記憶中我從「知人我」（懂得自己存在，識得人際關係）起，我就經常幻想、胡思亂想。從另一角度或層面認識，也許是這廣寬、清靜、陰涼，感覺十分安全 因為在杉仔林下，我未受到驚嚇甚至「打擾」，所以讓我「放心」去胡思亂想、幻想。……哲學的「理論」告訴我，我長大後也不斷「自我實驗」：「我不可能認知我的；我認知的是客體化的我……」很奇怪，在杉仔樹林下的我，「好像」曾經認識到「未客體化的我」呢！

³² 處所理論主要從人與特定自然區域的關係之角度思考人的生存、異化與生態身分，重視人的存在與特定自然區域的依附關係，不同於地理學意義上的空間，是融入人的情感、意義和價值。王諾：〈處所理論與生態文學〉，《興大人文學報》第 53 期（2014 年 9 月），頁 3-10。

³³ 葉石濤評述李喬小說世界觀是將世界視為由各種痛苦所織成的廣大苦網。李喬敘述痛苦就是一種生命的符號，生命的現象是「動」，「動」就是一種「痛苦」。葉石濤：〈論李喬小說裡的「佛教意識」〉及李喬：〈一位臺灣作家的心路歷程〉，收於彭瑞金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7 李喬》，頁 174 及 132。

(〈杉仔〉，《草木恩情》，頁 22-23)

引文所述幻想、記憶之外，「夢」也是暮年李喬扣連童年空間的重要載體，包括夢境所現心靈呼喚的蟬鳴、紅毛蟹、麻雀、雲豹等各式物種動態身姿，形構已不復見的故園景色。此敘事修辭回應了反思型懷舊傾向涉及過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而關注個人記憶對懷舊的「懷」，追求懷念過去的徘徊感。³⁴ 研究者陳惠齡解讀李喬的草木空間具有殘忍與慰藉的二重悖逆性，也是作家獨特的心靈風景。³⁵ 他以山線空間的生態區域為座標，雖然限制居所令李家只得仰賴造林維生，卻也獲得超然世外而能思考自我存在與人際關係的庇護空間，顯現人的主體建構不完全求諸自身內部，亦在身外處所。在此自然環境中，李喬摸索我從哪裡來以及如何生存的問題，以確認身分、自我和角色，反轉了抽象的由上而下的國族認同敘事，由物我平等的生態環境確立身分認同。

蕃仔林的童年歲月是李喬的生命源頭與文學起點。³⁶ 李喬的懷舊書寫將故鄉記憶的正負情緒存蓄統合，包括生命態度、人際關係、自我評價、社會連結等過去到現在的比較，以加強自我價值和感受的治癒。³⁷ 而家屋是具有記憶、想像和夢想的地方，得以塑造對外在空間的認識。³⁸ 李喬以家屋為基點構築童年空間的

³⁴ 反思型懷舊的「懷」舊特性，參見（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著，楊德友譯，劉東編：〈第四章 修復型懷舊：密謀與返回本源〉，《懷舊的未來》，頁 46-47。「修復型的懷舊表現在對於過去的紀念碑的完整重建；而反思型的懷舊則是在廢墟上徘徊，在時間和歷史的斑斑鏽跡上，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時間的夢境中徘徊。」

³⁵ 陳惠齡：〈另一種台灣田野誌—李喬《草木恩情》的自然書寫〉，頁 16-19。

³⁶ 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李喬》（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26。

³⁷ 懷舊應用在 1950 年代老人護理領域被談及，是富創造性的護理措施，協助病人回憶過去以統合感覺、想法，加強自我價值和持續性感受，降低死亡焦慮。柯瓦克（Christine R. Kovach）把懷舊治療分成正向和負向的兩大回憶型態。李歡芳：〈老人自尊與懷舊療法〉，頁 99。

³⁸ 家屋的意義，參見（美）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第二章 地方的系譜〉，《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頁 42-43。

家園記憶，如〈牛筋草〉突破家屋周圍崎嶇山巖與碎石陡坡生長的牛筋草，生命強韌且長得平順，成了寂寞童年認識環境的遊樂項目；另外，童年家屋坎下山徑旁的梧桐樹土墩，樹身物景即扣連兩段李喬守望親人的溫馨記憶：

在未上學的時候，媽媽揹著小妹妹「上街」的日子，日頭微微斜向大湖街背山頭了，我就牽著大妹走到梧桐樹下等候媽媽出現在陡坡轉彎處。那種遼望等候，心裡酸酸的，也有一絲甜蜜。因為等著等著，媽媽一定會出現。

另一段梧桐樹守候的日子比較渺茫：那就是太平洋戰爭前兩年，二哥國校畢業，十六歲，以第一名畢業的榮耀被選為「海軍工員」，未經任何訓練，直接送到日本東京西鄰神奈川縣，當飛機製造廠工人……於是我們開始等待與二哥團聚的日子。（〈梧桐、油桐〉，《草木恩情》，頁 103）

懷舊的積極意義是將記憶的正負情緒加以存儲，讓人可以有意識地獲取回憶，避免陷入負面情緒。是故，懷舊實為一種自發性的情緒調節。李喬藉由梧桐樹勾連等候媽媽、二哥歸來的個體記憶，表露對窮苦童年美好經驗與理想的追尋。此敘事一方面呼應人類邁向衰老過程中尋求自我安慰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呈現普遍的內在受苦經驗。這種受苦乃因成長是時間銘刻在身體生命的綿延經驗，個體意識欲永留美好經驗卻受限時間而感悵然，因此童年記憶總會片段浮現於當下感知所致。³⁹ 此外，這份悵然也受到人造文明來臨的機械化趨勢下，作家面對無法遏止的己身衰老與已逝的山林生態故友們之內在感傷所促發。

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c H. Eric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指出老年期發展任務危機為自我統合與絕望。⁴⁰ 李喬回顧過往生活情景有惆悵有欣喜，感傷老來

³⁹ 蔡淑惠：〈童年、記憶、事件隱像形轉：幾米的《失樂園》〉，收於蔡淑惠、劉鳳芯主編：《童年·記憶·想像：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頁 153。

⁴⁰ （美）艾瑞克·艾瑞克森（Eric H. Erickson）、（美）瓊·艾瑞克森（Joan M. Erikson）、（美）海倫·克夫尼克（Helen O. Kivnick），周伶利譯：《Erikson 老年研究報告》（臺北：

環境無魚、無鳥的寂寞，卻也得到當下生命的滿足與肯定。他藉空間懷舊重現生命經驗以協助因應目前的生命問題，這是維持自我確認和接受自我過去的生命階段發展，借助回憶過去延續現在與未來。李喬自述「我已八十二歲，叫作暮年，晚年也」（《草木恩情》，頁6），顯現他對老年主體的充分意識。在此意識上，他滿懷對萬物的感恩，並重述山林物種的相處存有之於晚年生活的重要，以求回歸塵土時能被大自然「接納」。這樣面向死亡、預備死亡的歸返自然之生命態度，一則表徵李喬透過懷舊敘事進行自我療癒，達到立言著述而有尊嚴的生命統整目的；⁴¹ 一則回應了反思型懷舊中對人的有限性之深層哀悼與熱衷於懷舊空間的徘徊欲求。

（二）母親 / 母土的記憶召喚

認同作為人類的文化動作，是個人欲力的選擇，而懷舊可被視為認同建構的方式之一。懷舊又是呈現記憶的一種手法，不僅是關於過去，而且是連繫現在、延續未來的意識機制。李喬自敘「人老年之後，『記憶』會是很『奇異的存在』」（〈水獺、果狸〉，《游行飛三友記》，頁195），他剖析奇異在於人慣以理性介入模糊的記憶進行校對，而發生違逆感。若接續前述作家以懷舊敘事因應生命衰竭危機的做法，可見作家摻以理性來確認自我回憶的自白，是比對或反省今昔之我，以加強自我肯認和價值感受的身分建構實踐。又回顧生態文學的論述亦具有重新定義身分認同的意義，強調地方、環境對主體性的影響。⁴² 因此，老年、懷舊、生態概與身分認同之命題相關，亦能推知作家暮年擇此題材的寫作動機。日治時期的童年成長記憶總在李喬的文字中揮之不去，包括窮困僻壤的山村生活、1939年罹患瘡疾的創傷經驗，以及適逢太平洋戰爭所見的人間疾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336-338。

⁴¹ 老年想像中身體管理與迎接死亡的生命進程與寫作心理，參見黃柏源：〈蘭姆書寫中的老年與退休〉，頁110-114。

⁴² 蔡振興：〈緒論 生態文學批評〉，《生態文學概論》，頁3-4。

病、飢餓與死亡的圖像。⁴³ 前述生命意識、成長創傷再加上暮年寫作的時點，莫不激發李喬於《草》、《游》二作當中運用根植於土的地方感，以山線家園為中心強化個人生命認同的穩固安全感，從而展現懷想在地社群景觀的家族記憶書寫。⁴⁴

社群的生活形態是融合於特定的土地景觀，因山村的險峻風土孕育出李喬獨特的精神結構與生活方式：他將個人記憶寄生於山線空間的地貌、植被、房屋聚落，延展串接成家族與地方史記憶網絡的敘事線索，主體生命史分由個人史、家族史、地方史架構。個人史之感發闡述如〈養蘭春秋〉、〈文鳥、十姐妹、錦靜、胡錦〉、〈吾家狗族〉，各扣合植蘭、養鳥、狗歷程所演繹的庶民生活史。又或是〈鷺鷥、小白鷺、白翎鷺、白鶴〉裡追憶過往生活樣貌兼述物種消逝的世代感懷，這是縱然以文字描繪也無法全然重現的景象真味；家族史書寫內「母親」則是相當重要的角色，鍾鐵民評述母親在李喬文本中呈現受苦犧牲的象徵，父親的形象相對顯得模糊，殘缺不全的。⁴⁵ 李喬亦曾敘述母親本身是個意象的呈現，並與大地意義相連：

人，大概越老越懷念母親，(這個，你小孩子就不曉得，不能體會了，哈哈)，母親的本身就是一個意象，就好像人來自於大地，這母親就是大地，而且我們每一個人，將來就要回歸大地 (這又是佛洛伊德教我的，哈

⁴³ 李喬自述山居窮農的成長、孤獨歧視的環境、多病敏感的體質、異文化經驗、以勤補拙的平凡天資是形成文學人李喬的背景與經驗，窮苦童年、孤獨深山亦是他的文學元素。李喬：〈臨走心聲〉及〈苦難與救贖的的火炬〉，《思想想法 留言》，頁 86-87 及 187-188。

⁴⁴ 地方感是人類在主觀及情感上對地方的依附與關連，其意義是動態開放的。其特性表現除了是生態地理的空間生產，亦為族群文化、在地傳統、區域生活型態、社會角色網絡、集體價值體系互為滲透的在地社群景觀。(美)蒂姆·克雷斯韋爾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第一章 導論 定義地方〉，《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4-15；陳惠齡：〈導論 怎麼談，怎樣看「鄉土」？〉，《演繹鄉土：鄉土文學的類型與美學》(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頁 41-42。

⁴⁵ 鍾鐵民：〈李喬印象記〉，收於彭瑞金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7 李喬》，頁 148。

哈) 有那種回歸大地的鄉愁，那麼，母親正好是一個代表。追求母愛，也是追求生命的本源，母親就是大地，大地就是人的本源。⁴⁶

母親葉女士給予李喬健康與安全的庇護，故母親是他生命的本源，等同於大地為人的本源般存在。評論者許素蘭形容「母親」不僅是李喬文學的重要象徵，也是生命底層中記憶與情感的初始。⁴⁷ 李喬的生態書寫同樣描寫母親對他生命存養的記憶接點：「我們兄弟結婚前一晚，媽會遞過來一包苧仔絲，放在衣櫃內角裡，說是『防身』之用。苧仔、苧仔，跟永遠思念的母親一樣，我永記在心裡」（〈苧仔〉，《草木恩情》，頁 97）可入藥亦可為纖維原料的苧麻用途廣泛，成年後的李喬移情視之如母親化身般懷念；〈葛藤〉、〈鴨公青〉則分別以杉樹間母親用葛藤圈繞的空間，與為子拔取鴨公青做藥而摔跌的身姿，刻劃辛勞母親對己身的養護，李喬彷彿回到現場以幼年時似懂非懂的心情詳實追憶；〈黃鱔、山龍〉則引幼時土龍印象，懷念羽化母親的尊生教誨。葉石濤指出外在物質的貧困枷鎖與母子關係構成的掙扎，是李喬痛苦哲學中重要經緯，也是其小說世界的創作取材。⁴⁸ 此取材經緯同見於作家的生態散文，童年貼近貧困與疾病的經驗，讓李喬極早感受到不安定而視母親為依靠，此經驗甚至影響日後人生觀、生命觀及文學觀，致其著作具有融入個人生命感悟的痛苦哲學。

李喬文學將自我個體對母親的家族情感與意象擴展至土地，甚至宇宙生命的思考層次。⁴⁹ 故《草木恩情》、《游行飛三友記》除了明述對生態人口的自我悔悟與文明批判，同時也於字句間穿插母親、母土與生態物種之相連記憶，交疊為敘事脈絡。生命記憶起點的家屋樣貌，如〈杙仔〉所寫是間居處斜板塊的深山舊屋：

⁴⁶ 洪醒夫：〈偉大的同情與大地的鄉愁：李喬訪問記〉，收於彭瑞金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7 李喬》，頁 163。

⁴⁷ 許素蘭：〈在修羅的道場 雙面壺闡提〉，同前註，頁 140-141。

⁴⁸ 葉石濤：〈論李喬小說裡的「佛教意識」〉，同前註，頁 174。

⁴⁹ 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李喬》，頁 73。

童年舊屋在「雪霸公園汶水遊客中心」之東，有名的「鷓鴣山」（海拔九〇一公尺）約四百公尺下，座東朝西的斜板塊上，住家上端是福州杉造林。

房子是朝西橫排，兩臥房中間是安置「阿公婆」神位的「人客廳」。小灶坑廚房、洗澡間搭在臥房後邊；在右房後邊再加一小小的「雞棲」。總面積約十五六坪、房舍外稱為禾埕或「天墀坪」的院子也約十五坪。屋後是石壁，前左右籬笆圍著。（〈杙仔〉，《草木恩情》，頁38）

李喬自嘲老家是「替人造林之家」，屋舍位處陡峭地勢。十五六坪的住家被杉林、雞舍、石壁、籬笆緊圍，顯得侷促狹隘，整體空間僅屋前植有桂花和番石榴的禾埕較為開闊，稱為「禾埕」的屋前空地卻苦無禾稻可曬；〈茅仔〉、〈蜈蚣、馬陸〉互文談起童年記憶中瓦屋、竹屋、茅屋等屋舍等級，最低等級的茅屋老家屋頂兩三年即積水嚴重，內裡藏身著各式蠕動、爬行的昆蟲，屋內的人與蟲猶如生命共同體共存一室，互依互生。深山茅屋的破陋樣貌對暮年李喬仍歷歷在目，也顯現以生態映照人世階級等第的書寫意識，銘刻窮困青春的記憶印記。

李喬的生態書寫或扣緊物種名稱、生長習性和外貌特徵起筆，或由個人生命記憶、歷史源流、俚諺傳說、大眾認識現狀切入。此筆法除了引介生態諸友予讀者，也表達生態人口與自我生命史的連結和現世觀察，如以蜻蜓習性抒發宇宙生命現象，或以梅花鹿象徵為「四十多年臺灣史事物追索的亮點」（〈梅花鹿、山羊〉，《游行飛三友記》，頁132），這些書寫也是憑弔眾生物種的悼詞。回首童年時光，若受挨打管教或見父母口角，李喬便直奔草木懷抱，一是躲入菅草叢養傷，二是到愛玉叢間排解傷恨：「我在『牛肝石』乒乓球叢中真是獨樂樂，自由自在。有委屈、傷心、憤怒，或想向誰傾訴什麼，就是有月色的晚上，我都會爬上山來到這裡。」（〈乒乓球子、愛玉〉，《草木恩情》，頁70）棲身愛玉叢的李喬感到被重重護衛著，在山村生態環境獲取穩定感，心神得以進入幽深空間中感受悲喜；而此記憶脈絡更由個人史、家族史敘事視域延伸至臺灣母土，如〈咬人狗〉敘述戰爭期受配給管制的臺人倚靠自然界「保鏢」咬人狗的環境掩護，而能躲避官方查緝儲糧；〈牛眼樹〉所寫赴玉井考察的作者親見牛眼樹下的

殘骸，見證了噍吧哖慘史的痕跡；〈柑橘大家族〉、〈蝸牛〉藉糖梨仔、軍用螺徵收聯想童年療癒的遊樂地和成長經驗，牽引出日治末期戰爭與空襲之近代臺灣歷史記憶。在物景懷舊與生態環境的疊影取材中，召喚作家個人記憶與土地族群歷史的集體記憶。

《草木恩情》、《游行飛三友記》不單是李喬憶舊以誌記個人與家族史的實踐，其探索的更是孕育自己且逐漸消逝的臺灣土地記憶，在直抒意念的散文中加強自我與臺灣母土的共在感。⁵⁰ 李喬生態書寫時空不斷於今昔跳躍離返，實是一重新審視自身棲居與生命歷程的記憶摸索，將其成長的挫敗、衝突與生態經驗連同成年的自己一併納入自我形象。《草》、《游》傾訴作家與生界間獨特的個人、家族乃至社會的史實及情感記憶，甚至將物種擴及為臺灣認同的表徵：「艱苦溯游，回到原生地，……『臺灣種』回途路絕，是就地延續下來的；牠的故事就在臺灣，這種象徵意義深長。」（〈鱒魚、鮭魚〉，《游行飛三友記》，頁110）作家亦由臺灣鱒魚和獼猴的特有種演化，強調人的發展如物種一樣唯有前進，由環境推演對臺灣普羅文化建設的想望。李喬的懷舊書寫呈示生態環境始終為童年以來的撫慰或避難之所，也是根植於土的個人生命、家族記憶與臺灣歷史交織纏繞的精神空間，此寫作脈絡深刻呼應了生態群落內所有的生命與非生命體是相互依存、相連相續的土地倫理觀。

四、結論：生態傳記的主體建構與關係探究

《草木恩情》由己身所為出發，為過往孽行悔悟或對受萬物供養致謝，《游行飛三友記》批判性較強，針對臺灣社會乃至人類全體的施為，抒發人性慾望、

⁵⁰ 研究者以詹宏志的懷舊敘事為例，論述過去事件和現在言說間的連續性，指出敘事者追憶往事是為了避免遺忘，並藉此加強命運相連之自我和他者的共在感。李喬的生態散文亦有此敘事傾向，之所以懷舊過往並非追求以古鑑今之用，而是強化自己與母土的連結。胡紹嘉：〈記憶寫作、日常生活與社會存在：以詹宏志的懷舊敘事為例〉，《新聞學研究》第118期（2014年1月），頁92及122-123。（DOI：10.30386/MCR.201401_(118).0003）

科技文明、產業結構等人類之惡的批判。成長記憶中物種的消跡、環境的剝奪和異化景況，激發了李喬的生態關照尺度，警惕人類行為對生態的榨取改造與錯誤認知。人與環境的失衡關係在李喬臺灣生態群落的書寫中凸顯而出，包括人類的精神異化、社會生活的物化與環境生態的疏離等變異；另一方面，李喬嘗試在物我關係的現代失衡圖景中，克服以人為中心的理性觀點，記錄、追溯自己、親族與土地群落之生活主體的互動反饋、歷史變化，互為建構主體性。此生態學視野下，加諸作家已身面對年歲逝去的生命焦慮，交疊成一場自我內部的主體追認過程。即李喬不單以二作諸篇立下生界人口今昔源流之傳記，同時亦於此生態書寫中顯影自我生命史，故其書寫圖式實為一部融匯物我的生態傳記。《草》、《游》系列作內擬人、移情的大量筆法，一則呈現李喬對早年經驗與依附關係的重現、應對，獲得生命存在的延續性體驗；二則展現成長經驗所積累的族群、階級、經濟之弱勢主體特徵。草木物種成為童年李喬的化身與映照，是作家對自我生命苦難的哀悼及肯認，亦為主體不可遺落的身分見證。

李喬以「蕃仔林」為參照座標，將童年扣連臺灣歷史與社會發展，藉生態萬物投射記憶至山村童年的空間，表達濃厚的懷舊意識與情感彌補。這種對個人過往記憶與社會群體的生活圖像再現，除了是自我身分與主體建構行動，也是某特定時空環境下的集體想像物。可謂李喬反轉了由上而下的國族認同敘事，由物我平等的生態環境確立主體認同；再者，懷舊是時間距離和地方移動所造成的心理因應，加諸人類的心理需求之一是緩解對死亡的恐懼，李喬的生態懷舊書寫因此具有與他者建立聯繫的意義，讓暮年的他在生命持續衰頹的過程中減少不安，並具價值確立的積極作用。李喬生態書寫的懷舊敘事，實際上是對自我老化的文化調適與情感軌跡。因此，其寫作意念陳述了對某一時空的懷舊、嚮往，以及對時間和空間的新理解，而具備回顧性與前瞻性；蕃仔林山線空間的地貌植被、房屋聚落、人際往來，串接了李喬家族與母土地方的記憶網絡，記憶的支流隨著邊陲家屋延伸至家園環境，更連結至土地。家屋、母親、土地群落分別對應個人、家族、地方鄉土的組構核心，表徵臺灣常民記憶的文化景觀與歸屬感。

生態、環境和人的關係探究，是《草木恩情》與《游行飛三友記》系列作主軸，也是李喬選擇性挪用生平經驗，結合地方生態景觀或社會情境重新理解過去

與未來的生命故事。⁵¹ 故此二作具有文化價值和定義自我的寫作傾向：一為生態倫理的人文批判；二是懷舊意識的對應呈現，且以當代臺灣生態回應了生態學的危機論述基調。⁵² 暮年李喬以表達自我的散文體裁，表達環境倫理學對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批判，同時表露向內追尋美好的書寫主體性，以及生命存在的延續性體驗；再者，李喬的自然書寫也從地方認同的物景紀實、想像、追憶擴及現代臺灣社會異象的相關批判，而富有重新理解人與土地、環境間交織的生命圖景之意義，以建立平等的倫理關係。李喬的生態書寫不僅記述自然生態，也演繹人性、個體創傷與社會的共同命運，見證生命韌性以及逐漸為人遺落的臺灣記憶。《草》、《游》二書可謂給予李喬回顧過往、建構童年而檢視人類社會的省思空間，從而得到懺悔的自我淨化與救贖，繼續暮年生命旅程未完成的價值尋覓與成長。

徵引書目

一、近人論著

(一) 專書

朱惠足、貝格泰 (Hannes Bergthaller)、唐納·菲利浦斯 (Dana Phillips) 主編：《全球生態論述與另類想像》(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16年)。

李喬：《臺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

李喬：《草木恩情》(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

李喬：《游行飛三友記》(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

⁵¹ 基於傳記式事實的個人生命故事可定義自我，亦可反映文化的價值觀與規範。胡紹嘉：〈記憶寫作、日常生活與社會存在：以詹宏志的懷舊敘事為例〉，頁95-98。

⁵² 生態批評的目的是讓不同群體跨越地理、政治與文化界線進行溝通，以文學文本與文化產物洞察環境議題背後的權力結構與運作邏輯，而具有全球現象與地方表述之間的論述協商意義。朱惠足、貝格泰 (Hannes Bergthaller)：〈序言〉，收於朱惠足、貝格泰 (Hannes Bergthaller)、唐納·菲利浦斯 (Dana Phillips) 主編：《全球生態論述與另類想像》，頁10-11。

- 李喬：《思想 想法 留言》（臺中：臺灣李喬文學協會，2019年）。
- 李育霖：《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 李有成：《記憶政治》（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年）。
- 杜國清（Kuo-ch'ing Tu）、羅德仁（Terence Russell）編：《台灣文學英譯叢刊（No.36）：李喬專輯》（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 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李喬》（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 陳惠齡：《演繹鄉土：鄉土文學的類型與美學》（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 彭瑞金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7 李喬》（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年）。
- 蔡振興主編：《生態文學概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 （美）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美）艾瑞克·艾瑞克森（Eric H. Erickson）、（美）瓊·艾瑞克森（Joan M. Erikson）、（美）海倫·克夫尼克（Helen O. Kivnick），周怡利譯：《Erikson 老年研究報告》（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 （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llana Boym）著，楊德友譯，劉東編：《懷舊的未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
-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嚴志軍、張沫譯：《文明及其不滿》（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
- （二）期刊論文
- 王諾：〈處所理論與生態文學〉，《興大人文學報》第53期（2014年9月），頁1-39。
- 朱增宏：〈把雨傘留給蚯蚓？—從動物倫理對佛教及「愛與慈悲」的挑戰，談「佛法」的實踐〉，《中外文學》第32卷第2期（2003年7月），頁

- 103-130。(DOI: 10.6637/CWLQ.2003.32(2).103-130)
- 李歡芳：〈老人自尊與懷舊療法〉，《護理雜誌》第 50 卷第 49 期（2003 年 12 月），頁 98-102。(DOI: 10.6224/JN.50.4.98)
- 吳文新、王豐年：〈論生態倫理學中的人性問題〉，《哲學與文化》第 33 卷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137-147。(DOI: 10.7065/MRPC.200607.0137)
- 吳明益：〈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台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0 期（2010 年 4 月），頁 45-79。(DOI: 10.6458/JTLS.201004.0045)
- 宋偉杰、李育霖：〈環境人文、生態批評、自然書寫芻議〉，《中國現代文學》第 36 期（2019 年 12 月），頁 1-5。
- 邱錦榮：〈作品、理論與生態批評〉，《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12 期（1995 年 5 月），頁 21-35。(DOI: 10.6637/CWLQ.1995.23(12).21-35)
- 林金龍：〈生態倫理：文明視野中的企業責任與經濟新秩序〉，《止善》第 1 期（2006 年 12 月），頁 81-101。(DOI: 10.6487/ZS.200612.0081)
- 胡紹嘉：〈記憶寫作、日常生活與社會存在：以詹宏志的懷舊敘事為例〉，《新聞學研究》第 118 期（2014 年 1 月），頁 87-129。(DOI: 10.30386/MCR.201401_(118).0003)
- 陳金定：〈移情現象之驗證：運動選手親子依附與教練—選手關係之因果模式探討〉，《教育心理學報》第 40 卷第 3 期（2009 年 3 月），頁 363-383。(DOI: 10.6251/BEP.20080509)
- 陳惠齡：〈另一種台灣田野誌—李喬《草木恩情》的自然書寫〉，《臺灣文學學報》第 34 期（2019 年 6 月），頁 1-31。(DOI: 10.30381/BTL.201906_(34).0001)
- 黃柏源：〈蘭姆書寫中的老年與退休〉，《英美文學評論》第 37 期（2020 年 12 月），頁 101-124。(DOI: 10.6711/REAL.202012_(37).0003)
- 鐘丁茂、徐雪麗：〈李奧波《砂郡年紀》土地倫理思想之研究〉，《生態臺灣》第 6 期（2005 年 1 月），頁 77-85。(DOI: 10.29820/TAE.200501.)

0017)

(三) 論文集論文

蔡振興：〈《劍羚與秧雞》中的童年記憶〉，收於蔡淑惠、劉鳳芯主編：《童年·記憶·想像：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頁49-74。

蔡淑惠：〈童年、記憶、事件隱像形轉：幾米的《失樂園》〉，收於蔡淑惠、劉鳳芯主編：《童年·記憶·想像：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頁131-176。

(四) 學位論文

黃小民：《歷史的謊言·鄉土的真實——李喬小說創作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

Eco-Confessions: Ecological Ethics and Nostalgia in Lee Chiao's Blessings of Nature and Three Friends of Land, Sea and Air

Lo, Shih-Yu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During the 2010s, Lee Chiao(1934-), an author with extensive writing experience, published two essay collections titled *Blessings of Nature* (2016) and *Three Friends of Land, Sea, and Air* (2017). In both collections, Lee used various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as outlets to reflect on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transcend th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memory perception dimensions of subjective humanism. The author wrote his own “Confessions” that presents his personal reflections of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cludes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memories of his family history, and details on Taiwan’s ecosystem. Because both collections focus on the author’s observations of ecological ethics, including the mod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atural life,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this study adopted the sam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Lee’s personal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civilization in the literature. Subsequently,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the ecological narrative is applied to present Lee’s life experiences based on his memories and to portray his nostalgic emotions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o reconstruct

his family history in his later years. Through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and writing strategies used in both collections, Lee employed an ecological ethics-based approach to present his personal reflections, advocate for local awareness, and offer ethical criticism of humanism. Accordingly, these essay collections reflect the author's life observation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istorical culture, and folk memories of Taiwan.

Keywords: Lee Chiao, Blessings of Nature, Three Friends of Land, Sea and Air, Ecological Ethics, Nostalgia

